

长江下游 考古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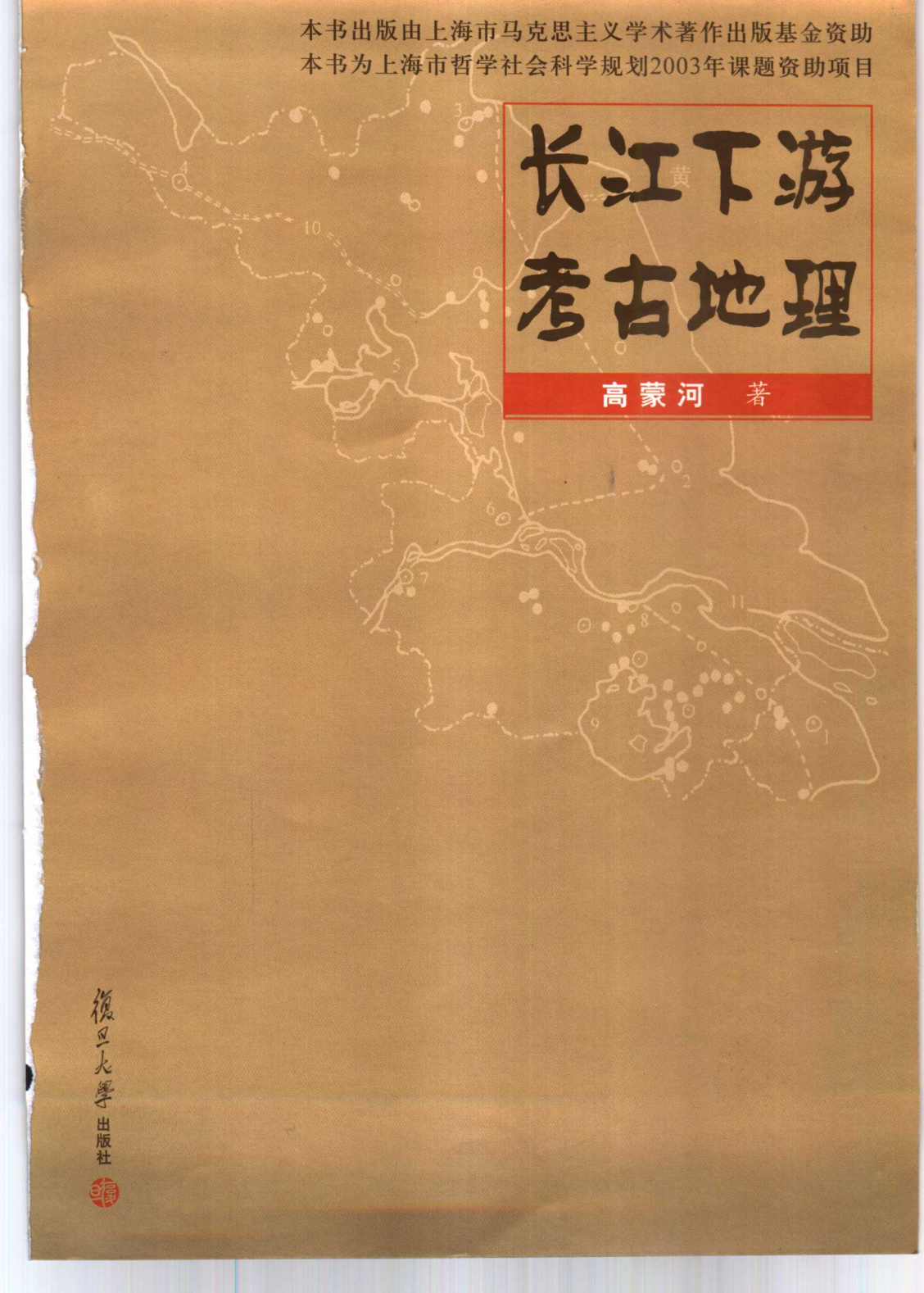
高蒙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本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3年课题资助项目



长江下游 考古地理

高蒙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下游考古地理/高蒙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2

ISBN 7-309-04326-X

I. 长… II. 高… III. 长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021 号

长江下游考古地理

高蒙河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吴仁杰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1

字数 338 千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00

书号 ISBN 7-309-04326-X/K · 142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高蒙河，蒙古族，1958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78年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后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做客座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出版《铜器与中国文化》、《三峡考古记胜》等著作四种，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六十余篇。

序 一

葛剑雄

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主张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阶段应限于历史时期,在晚年更具体说明,应该是从人类使用文字并留下记录开始。我有幸聆听过先师的阐述:

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说,它应该区别于古地理和今地理。在人类没有产生前以及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阶段,是古地理的研究范围。而当代的地理应该由今地理加以研究。从基本的研究方法而言,古地理阶段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能通过实地考察的办法复原当时的地理景观和地理要素,只能通过文字考释以外的办法。今地理则完全可以作实地考察,自然应以实地考察为研究的基础和主要途径。

我对先师这段话的理解是,无论是研究古地理、历史地理,还是今地理,其科学原理是完全一致的,但获取资料和数据的途径不同,因此学科特点和研究方法也有差异。而历史地理之所以要借助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离不开历史文献。正因为如此,先师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的研究时段上推至第四纪,因为那时不存在文字记载,如果要研究的话只能用文献以外的手段,那就与古地理研究无异,而历史地理研究的长处却无用武之地。

从我给研究生开设“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课起,我一直采用这样的说法: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阶段应该从文字的使用并留下

记录开始。但在三年多前,我指导的博士生周筱赟在听课课后向我提出,为什么一定要有文字呢?文字以外的资料如符号、图画或实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研究的依据?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作了纠正,将“文字”改为“信息”,自然可以包括文字及文字以外一切能够记载或传达某些内容的素材。以后我与筱赟合著《历史学是什么》一书时,就采用这种说法。

这门课我是每年开的,在以后讲到这部分时,我总觉得在历史地理与古地理之间还需要一种过渡。在人类使用文字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不仅留下了文化遗址,还留下了大量实物,也包括符号、图案、图画等。这些信息一般直接用之于地理学研究,也难以用历史学的方法进行解读和分析,主要还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才能复原当时地理环境。所以,在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之间应该有一门考古地理学。但我对考古学知之甚少,也缺乏学科理论的积累,对建立中国考古地理学心有余而力不足。

恰好本校文物与博物馆系的高蒙河当时以副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历史地理为研究方向。蒙河在吉林大学时是与我同出先师门下的王妙发师弟的同学,与我实际也是同学。但因专业的关系,我只能忝为导师。不过,这也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增加考古学知识,了解考古的新进展。与蒙河的深入讨论,也使我对中国考古地理学的确立和发展更有信心。我认为,以蒙河的学术基础和考古实践,加上这几年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努力,最有条件为创建中国考古地理学作出贡献,因而希望他以此为博士论文的主题。

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蒙河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很高评价。此后蒙河又作了全面修订,增补了最新的资料,质量又有提高。本书是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交叉与综合的成果,由于蒙河在考古学方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接受了较系统的训练,自觉地融会各学科的优势,解决学科的理论 and 实际问题,因而能从更新、更全面的角度提出“考古地理”的新概念,富有创新意义。他还注意吸收最新成果,如运用 DNA 检测等方法验证和解决以传统方法无法确认的疑问,是有益而成功的尝

试。本书的主要论据汇集了迄今为止全部考古成果,资料扎实,数据准确,分类恰当。

竺可桢生前曾将气候变迁的研究划分出一个“考古时代”,但尚未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本书的完成和出版有望填补这一空白,为中国考古地理学的建立打下一块基石。由于我对本书负有一定的责任,又寄望于这门新学科,所以写上这些话,愿为此目标与蒙河共勉。

2004年7月23日

序 二

蔡达峰

对于考古学与地理学,我知道不多,对这两种学科结合的成果,更缺乏鉴赏力。高蒙河先生以这种成果示我,并嘱我写序,不是想让我贻笑大方,我们虽在不同学科,但同事于博物馆学专业,彼此了解,他是让我借机抒发感想。他知道我想说什么。

说博物馆学是一个专业,其实是博物馆、文物与考古等学科的综合体,这是政府按照文博考古管理体制设置的。但学术管理上,这种结构就有所不适了。

学科或专业,作为研习特定知识类型及学术规范的机构,很讲究自身的规整,具有排他性。不同学科的人员可以合作研究,但设置多学科机构,则需要相应的组织形态和制度保障,以兼顾各学科的发展需要。以一个专业的框架,“安装”几个专业的内容,就会出现结构性制约。

在这样的专业机构中,跨学科的教师,需要兼顾工作要求和自身学术发展的需求,需要适应与协调。高蒙河先生以考古专长,承担博物馆学专业的考古学基础教学任务,并非难事。然而仅凭此事,渐离两个专业领域的主流,产生孤寂感,是很有可能。我有这种感受,但高蒙河先生显然善于协调,这部专著的问世,就是证明。这是令人鼓舞和羡慕的。

复旦有各种学科,这些资源,可以用来研究各种问题。高蒙河先生看到了这点,这几年,他积极与历史地理学、生命科学领域开展合

作研究,在合作中开拓考古学研究领域,这部专著就是他开拓与融合的成果。可见,自我发展是很重要的,关键是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避免狭隘的专业思想的局限,以开阔视野,判断问题,兼容探索,从而自身实现学科交叉。

学有专攻,考古学有独特的研究方式,但其研究对象及问题,是人文与自然的综合,是历史的整体现象。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表现出某些客观的特征。考古学要更准确地发现和理解这些特征,揭示事物的真实,就要有更全面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更多的学科协作,这样做虽然很难,但一定是具有学术生命力的。

上述不着边际的感想,权作序言。

2004年4月29日

本书摘要

本书是在“全球变化研究”的国内外科学计划背景下,所进行的中国“考古时代”长江下游 500 年以内尺度区域环境的恢复性重建研究。

研究的具体目标,是采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手段和成果,以考古学遗存为对象,以长江下游为空间范围,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以距今 7000—3000 年前为时间跨度,探讨这一时空框架内文化发展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该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和格局中具有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同时,还将考察考古地理学成为历史地理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尝试借此充实或完善历史地理学的现有学科体系。

通过研究,重点探讨以下课题。

(1) 在过去以千年为尺度的基础上,采取量化手段,分析长江下游考古时代诸文化发展进程,为研究长江下游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提供 400—200 年尺度的高分辨率序列,绘制完成 12 幅该尺度内的考古时期地图,变以往的趋势性观察为过程性解析,增加可视化效果。

(2) 提取遗存中的环境信息,解剖广富林、龙南和龙虬庄等典型遗址,初步建立长江下游考古时代有代表性区域和时段的人文环境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

(3) 探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时代的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就良渚文化兴衰过程进行分析,辩证认识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聚散以及环境变异期的人群迁徙原因。

(4) 总结长江下游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乃至文明起源过程中,是否扮演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重要角色,是否具有自身发展模式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考察该地区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或文明格局中,是否具有—般性规律与特殊性过程的双重特征。

(5) 以考古遗存为研究对象,拓宽历史地理研究的资料来源和利用领域,考察考古地理学成为历史地理学乃至地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6) 在充分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还应用科技考古学的方法提取更多的信息,并讨论这些手段在考古地理学研究中的可行性。

根据以上研究目标,本书首先构建了时间框架。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文化序列进行分期排队,将历时约 4000 年的考古时代划分为 12 个发展阶段,平均每个阶段约为 350 年跨度,其中最小跨度期可以细化到 200 年左右。但分期结果也表明,对于那些只经过田野调查或材料公布过于简略的考古遗存,尚无法进行如此细化的分期,这意味着本书的相关结论还存在进一步完善和修正的空间。

考古地理学的核心是对遗存进行区域性和局域性空间特征分析。在区域性研究中,本书全面收集了文化属性明确的 757 个遗址,着重对聚落量值变化、文化埋藏重合指数、聚落密度、聚落位置移动等要素进行统计分析,并加以平面图、柱状图、曲线图和表格化处理。图表显示,长江下游遗址群的时空分布有不均衡的特点。崧泽中期以前的 1—5 段期间,遗址数量少,空间分布呈散点状,重合型遗址较多,历时约 1600 年;崧泽晚期到良渚晚期的 6—9 段期间,遗址数量激增,空间分布密集,单一型遗址增多,历时约 1400 年;马桥早期开始的 10—12 段期间,遗址数量骤减,空间分布又呈散点状,单一型遗址增加,历时约 900 年。

对局域性单一考古遗址中所包含的人地环境信息的考察,本书选取了广富林、龙南和龙虬庄等典型遗址,分别进行了自然环境景观、人文环境景观和综合环境景观三个方面的复原与重建。

重建自然环境景观的案例是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重点解析了

作者曾参加考古发掘的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分析表明,广富林遗址至少在时属 7 段的距今 5300 年前后,已经转变为淡水湖沼环境,并逐渐进入温暖湿润时期,为人类到此居住提供了可能性。而到了时属 9 段的良渚晚期,气候又变得温凉干燥,泥炭堆积反映出当时水域有扩大的迹象,不再利于人类生存。导致土著的良渚人群被迫迁徙他处,而外来的北方人群更因为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只是短时期地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后,也不得不迁徙而去。

人文环境景观的复原选取了苏州地区的龙南遗址加以典型分析。发现长江下游地区有地穴式、地面式、干栏式和台基式四种建筑结构形式,前三种形式多与乡村聚落相联系,有居址属性;后一种形式与中心遗址群的都邑有关,有宫殿属性。距今 5000 年前后的良渚早期,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阶层性分化明显,社会性质正在向质变阶段过渡。龙南聚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向心式家庭开始解体,离心式家庭不断增多。对典型的 4—5 口之家和墓地的案例分析表明,聚落内部已出现了分化和贫富差别。而聚落之间,中心聚落的高等级“玉殓葬”多建筑在经过人工修整的台墩上,普通聚落的低等级小墓多分布在自然山丘或平原上。

有迹象表明,长江下游各区域普遍不使用土筑城墙的方式来构筑聚落防卫系统,而多是利用植物编织篱笆并辅以环壕的形式,这间接反映出三角洲地区多水域、多渚墩的地理环境特点和植被丰茂的景观,而且一些地区的土壤黏湿特点似乎也无法像中原等地那样适合构建高大的夯土城墙。此外,遗址分布的疏密程度和聚落选址的高程落差,也反映出水域环境的不断变迁。

具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重景观的典型遗址是位于江苏苏北高邮地区的龙虬庄。分析结果显示,时属考古时代中前期的该地区人类生存环境,为芦苇丛生、水草茂盛、水网发达的河湖沼泽湿地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 2°C 左右。考古时代的人类居住在河边湖滨的平地上,从事捕捞狩猎、家畜饲养和水稻种植三种经济活动。其中,后两种获取生存资源行为方式的比重不断加大,反映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压力以及环境的变化。

长江下游考古时代的聚落演化存在三种模式：断裂型的进化模式为主，跳跃型的异化模式为辅，连续型的进化模式极少。因而反映出在特定地理环境下，长江下游文化发展过程是一种非连续进化的模式特征。这种断链模式与遗址所在的地理环境变化息息相关，而且在良渚晚期开始的环境变异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东部以太湖为中心的三角洲平原文化多呈“连续”中的“断裂”模式，相对比较稳定，向外辐射的能力强；而西部苏皖丘陵平原和江北里下河湖沼淤积区的文化则呈“断裂”中的“连续”模式，是中原文化区、江汉文化区和三角洲文化区之间交流的通道，文化面貌经常变异，人群你来我往，呈“漩涡”状或潮退浪进态势。

在长江下游，地势等“硬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制约，不如气候和水患等“软环境”表现得那样明显。而且，长江下游的环境景观并不是单向而是经过自然动力和人为动力双向合力共同构建起来的，两者互为因果。在考古时代前期，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相对协调，但到了考古时代后期，降温和水患等环境变异事件，再加上人口激增、耕地扩大和文明兴起等因素，人地矛盾激化，并导致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走向了逆协调发展的轨道。

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演化历程在中国各区域人地关系中是否具有普遍性，当然并不是本书的研究所能解决的，然而有一个并非偶然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那就是在本书所属良渚晚期开始的距今 4000 年前后，中原地区以外的周边各文化圈普遍地出现了文化发展的断链相。这是否与当时的那次由天体运动引发的大幅度降温事件相密合，还需要实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演化轨迹与中原地区大相径庭，长江下游呈断续演变模式，中原地区则是连续发展模式，并导致中国第一王朝在黄河流域而非长江流域诞生。

因此，就中国的文明化进程而言，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那教科书式的中国提供给世界的“连续性发展模式”说，实质上只是就中国的黄河中心区域所提取的蓝本，并不能也难以涵盖中国全境。换言之，犹如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结构一样，“断续相伴”才可能是中

国文明化进程的基本模式。再言之,如果确实是距今 4000 年前后的环境变异事件造成了中原以外各区域的文化发展断裂,那么,中原地区何以能脱颖而出并持续性地得到继往开来式的发展,则是本书提出和今后需要努力研究的人地关系课题了。续言之,通过使用地理学和考古学手段来整合如此重大的人地关系课题的实践,作为历史地理学组成部分的考古地理学,也就在“全球变化研究”的国际学术背景下和中国区境的微观和宏观地理学研究实践中,经受了一次严格的洗礼。

ABSTRACT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background of “Global Change Studies”,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se River in terms of archaeological sequence within a range of 500 years.

The concrete o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se River between 7000 and 3000 BP by using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Meanwhile, it will explore a potential whether archaeological geography could become a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main points will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1. On the basis of chronological scale of thousand years adopted previously,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will be taken to provide a detailed sequence within the limit between 400 to 200 years and to produce 12 maps of an archaeological sequence since the Holocene.
2. To analyze some typical sites such as Guangfulin, Longnan and Longqiuzhuang and to set up a landscape of both humanist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3.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o analyze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Liangzhu cul-

tu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diffusion and migra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4. To make a comment that the Lower Reaches of Yangtse Riv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history. Its unique pattern differs tremendous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the country.

5. To expand a data base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by usi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means an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whether archaeological geography could become a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6. Using technological methods and discuss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methods employed for the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ge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topics mentioned above, about 4000 yea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equence is divided into 12 phases with a shortest interval within 200 years.

About 350 sites have been thoroughly collected. Statistical approach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numbers and density of settlements and then illustrated by diagrams. It is found that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was unbalanced. During Phases 1 – 5 which lasted about 1600 years, settlements were less in number and scattered sporadically and many were reused. During Phases 6 – 9 which lasted about 1400 years, settlements wer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and densely distributed. Sites with single component increased as well. During Phases 10 – 12 which lasted about 900 years, the quantity of sites dramatically decreased. They sporadically distributed. The sites with single component increased.

The Guangfulin site is used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environmental change. It shows a warm and moist environment about 5300 BP represented by freshwater lakes and swamps, which provided an

ideal habitat for ancient residents. About 4000 BP, however, temperature became cool and dry and the water areas expanded, which might be unsuitable for human habit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landscape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Longnan site in Jiangsu Province. Among four types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s might be related to hamlets or villages, while palace architectures might be related to towns or citie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about 5000 BP, social stratification became obvious and social structure might be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centripetal to centrifugal families. High ranking burials of central settlements were commonly constructed on artificial mounds while small tombs of small tribes were ordinarily built on natural hills or plains. Som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in the Yangtse River Delta defensive systems might have been built by using bamboo fence rather than earthworks. It might be conditioned by local environment where water areas were abundant and vegetation flourishing.

The Longqiushan site in Gaoyou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reflected both natural and humanistic landscape. This area was a marshy plain with warm and moist climate and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t that time was about 2 degrees centigrade higher than present. People lived near rivers and lakes, fishing and hunting, raising stocks and planting paddies.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agriculture and domesticate animals reflect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During the early archaeological stag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se River seems harmonious. However, during the more recent archaeological stag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such as cool temperature and inundation, as well as population pressure, farm expansion and the